

# 四川漆器的早期发展

明文秀 (成都博物院)

摘要：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结合新的考古资料，将商周至汉的四川漆器发展演变进行了新的研究。本文将其分为五期，即商周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秦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期，每期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四川漆器；商周至汉；典型器物；分期；特征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8)06-0061-08

## 一、前言

漆器，是中国人智慧和劳动的创造。《韩非子·十过》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这是关于古代漆器的较早记载。由此看出早期漆器不仅是重要的生活用品，还是难得的奢侈品和祭祀品。早在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就有漆器。往后发展，漆器工艺形成千文万华之势。

四川漆器，就是四川地区生产的漆器。四川不仅是重要的产漆地，也是早期漆器生产中心之一，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汉书·贡禹传》载：“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地理志，‘河内怀、蜀郡成都、广汉皆有工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其出土数量多，种类丰富，时间跨度长，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随之不断增多，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有学者已认识到早期四川漆器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如聂非的四期说：“殷商时期的发展期；春秋战国时期的繁荣期；西汉时期的鼎盛期；东汉时期的衰落期”<sup>[1]</sup>。李昭和的四阶段说：“原始时期——原始社会晚期；发展时期——奴隶社会；成熟时期——战国时期；繁荣时期——秦汉时期”<sup>[2]</sup>。这种分期探索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不过，笔者认为漆器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环境的转变、人们的需求、国家政策的调整等，恐怕不能单单依据朝代的更替来断代一种制造业的发展。本文拟在过去前辈们研究基础之上，利用新资料，探讨四川漆器早期（商周至

汉）发展规律。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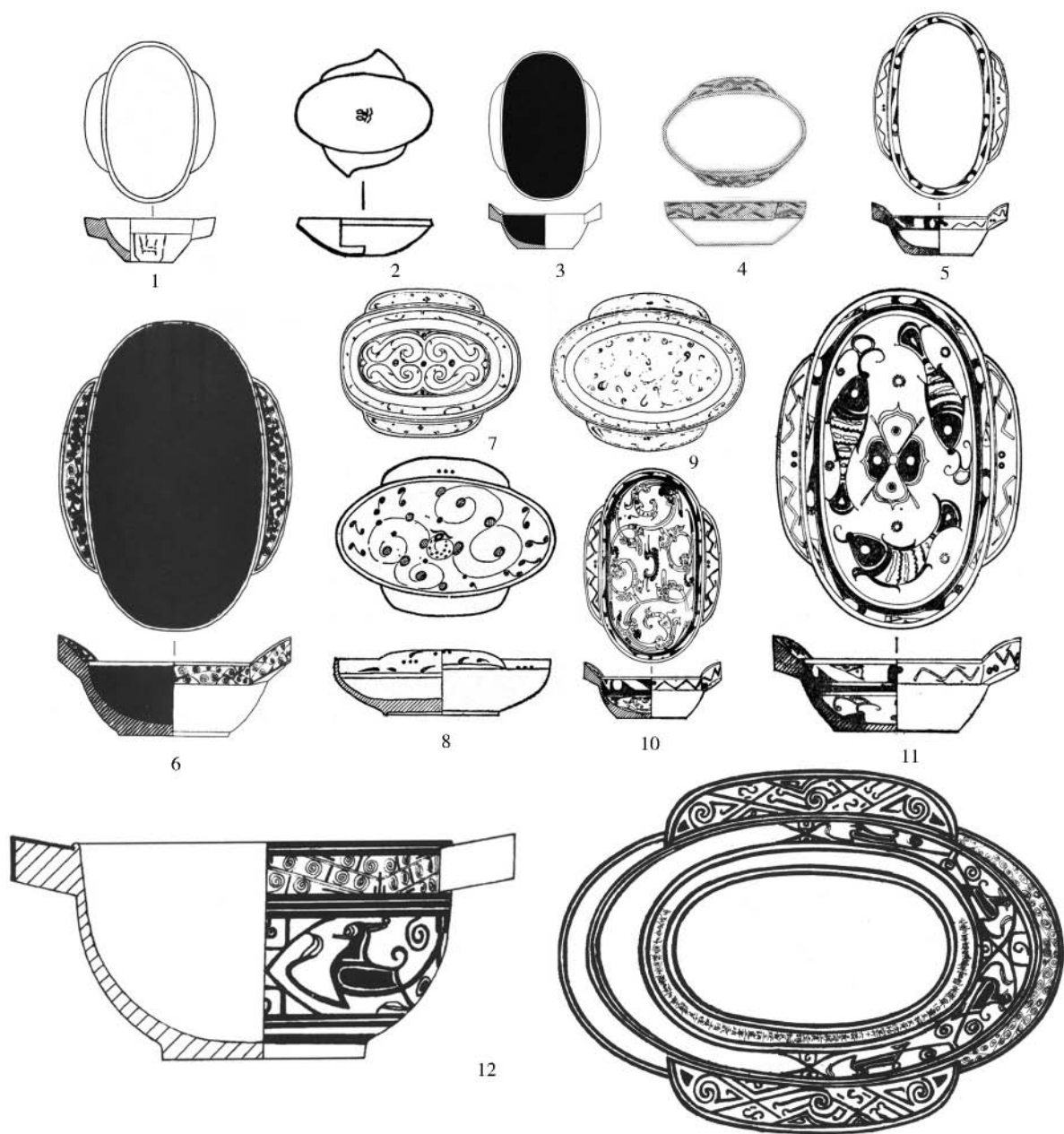
## 二、出土早期四川漆器的典型遗址

商周至汉，四川漆器出土地点遍及国内外，主要有四川、湖北、湖南、江苏、贵州等省，以及朝鲜原乐浪郡的汉代墓葬。现将典型遗址举例如下：

成都市商业街独木棺墓葬<sup>[3]</sup>：战国早期墓葬。出土木胎漆器，胎体厚重，有生活用器、乐器和一些不知名的杂件。生活用器有簋子、耳杯、圆盒、圆盘、簋、案、几、器座；乐器有鼓和木槌。色彩有朱、褐、黑三色，以黑漆为底，朱色和褐色为彩。技法主要是线描和单线勾勒再加平涂。纹饰主要是单元格走龙纹和变形龙纹二方连续，另有少量其他纹饰，如窃曲纹、同心圆圈纹、S 形纹、三角云纹等。“它的发现表明最迟在战国早期，蜀人就有相当发达的漆器制作工艺了……把成都漆器工艺的发达时间提早了近二百年”“商业街漆器可视为巴蜀文化的漆器。”

青川战国墓葬<sup>[4]</sup>：战国中晚期墓葬。漆器以木胎为主，少量在木胎上贴麻布。器物包括耳杯、双耳长杯、双耳长盒、圆盒、圆奩、卮、扁壶、圆壶、碗、鸭嘴壶、匕。黑底朱彩。绘画技法为线描加平涂。纹饰有龙凤、云纹、花草和几何纹等。尽管学界对该批漆器的文化属性尚有争议，但“成亨”、“成草”则表明其为四川所产，荣经曾家沟 21 号墓<sup>[5]</sup>漆器与之相同。

湖南马王堆汉墓<sup>[6]</sup>：西汉早期墓。漆器胎体有木、竹和夹纆胎。种类多样，有耳杯、具杯、圆盒、方盘、盂、多子奩、圆奩、方奩、椭圆形奩、鼎、钹、钲、卮、匜、壶、扁壶、匕、几、陆博。色彩丰富，有黑、红、赭、灰绿、黄



图一 耳杯

1、A 式（荣经曾家沟 M16：2） 2、A 式（新都战国木椁墓） 3、A 式（荆州高台汉墓 M2：251） 4、Ba 式（青川战国墓 M40：8） 5、Ba 式（江陵凤凰山 M168：191） 6、Ba 式（荆州高台汉墓 M33：41） 7-9、Bb 式（8：青川战国墓 M37：1，7、9：荣经曾家沟 M21） 10、11、Bb 式（江陵凤凰山 M168：193、175） 12、Bb 式（湖南永州鸽子岭汉墓 M2：65）

和白色。纹饰技法以彩绘为主，出现新工艺——针刻和金箔贴花。纹饰有三类：变形纹、具象形纹和几何纹，整个装饰线条流畅，大有一气呵成之势，富有极强的动感和韵律节奏。经多方专家考证，这批漆器的烙印文字有“成市草”、“成市饱”、“成市口”、“市府”等文字，表明其制作地为四川。俞伟超先生认为“马王堆一号墓与凤凰山八号墓出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与之风格相同的有马王堆汉墓群、荣经古城坪秦墓<sup>[7]</sup>、绵阳永兴双宝山木椁汉墓<sup>[8]</sup>、渠

县城坝遗址秦汉墓葬<sup>[9]</sup>、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群<sup>[10]</sup>、荆州高台秦汉墓群<sup>[11]</sup>等出土的大部分漆器。

朝鲜原乐浪郡汉墓群<sup>[12]</sup>：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期墓葬，以石岩里第 194 号墓为代表。胎体有木胎和夹纻胎，夹纻胎漆器增多。胎体轻薄，多扣器。器物以生活用品为主，有耳杯、圆盘、榼、旋等。黑底朱彩，纹饰有龙纹、凤纹、熊纹、怪兽纹和流云纹。“蜀郡西工”、“蜀西工”、“广汉郡工官”“子同郡工官”、“成都郡



图二 圆奩

1、式 (荥经曾家沟 M16:1) 2-4、式 (青川战国墓) 5、式 (江陵凤凰山 M168:13)

工官”等表明其生产地是四川。与之相同的有贵州清镇和平坝汉墓、江苏邗江姚庄 102 号汉墓、湖南永州鹤子岭 2 号汉墓等地出土的漆器。

### 三、典型器物

四川漆器种类丰富，以生活用器为主，有耳杯、奩、盘、碗、卮、双耳长杯、案、器座、簋、鼎、壶、扁壶、钗、匜、方平盘、樽、盂、多子奩、具杯盒、匕、梳、陆博盒、俑等，乐器较少，有鼓和槌，丧葬用器有俑。由于篇幅有限，不一一列举。现将典型器物分述如下：

耳杯：其数量占四川漆器的一半以上。总体形制：月牙形双耳，椭圆形口，装饰风格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A 型：素面耳杯。以耳部的变化分成三式。

式：耳与口部平齐。荥经曾家沟 M16:2，厚木胎，斜直腹，平底，内外髹黑漆。一侧外耳下有残“六”字，耳背上一“丿”符号，耳杯一端外壁上有金文风格的“𠄎”字（图一：1）。

式：新都战国木椁墓漆耳杯，木胎，蝙蝠形耳，平底，内髹红漆，耳髹褐漆。内底绘巴蜀

图形符号（图一：2）。

式：耳部高于口部。荆州高台秦汉 M2:251，形体较大。假圈足，内髹红漆，外髹黑漆。一耳上朱书一“李”字，外底有烙印文字和针刻符号，估计是“成”（图一：3）。

B 型：彩绘耳杯。以装饰部位不同分成两个亚型。

Ba 型：杯心无纹饰。以纹饰的变化分式。

式：耳杯口部和耳部有纹饰，青川战国 M40:8，厚木胎，耳略低于口部，平底，内外髹黑漆，口部朱绘一圈宽带纹；耳面朱绘变形云纹和曲折纹（图一：4）。

式：江陵凤凰山 M168:191，厚木胎，耳高于口，弧腹，饼足。内壁近口沿处和外壁髹黑漆，余髹红漆。内壁近口沿处朱绘变形三角鸟头纹二方连续图案，耳和外壁上部朱绘圆点纹和波折纹二方连续图案。此式耳杯纹饰丰富，有几种几何纹组合构成二方连续图案（图一：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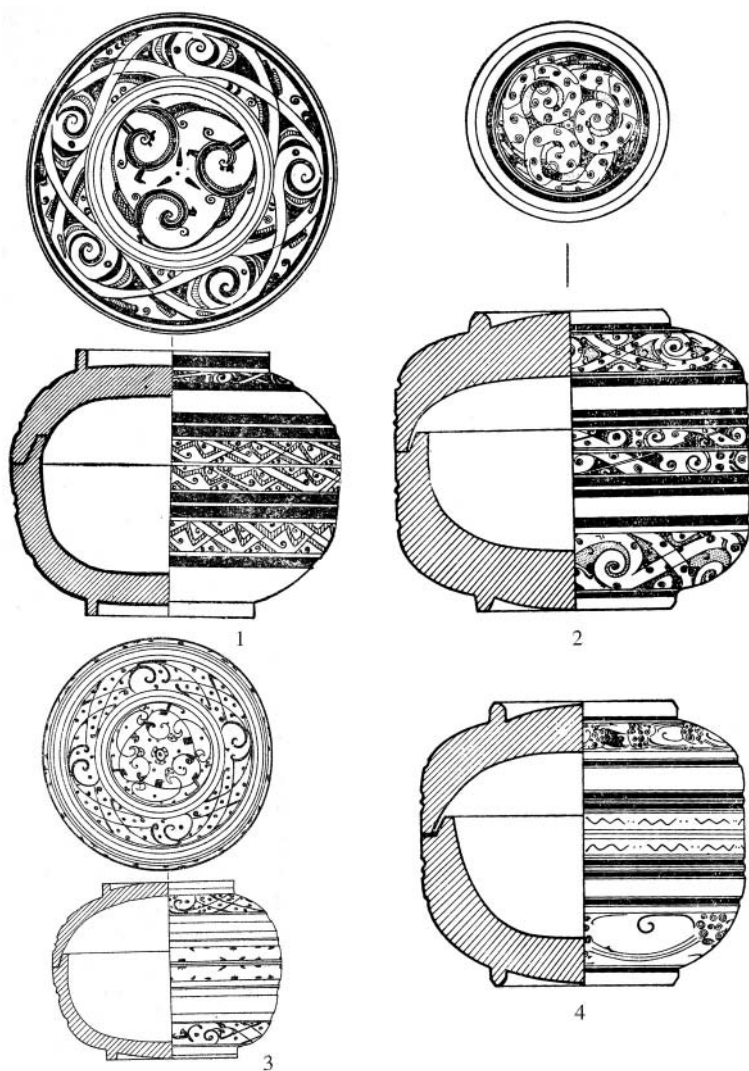
式：荆州高台秦汉 M33:41，形体较大，厚木胎，耳部上翻，高于口部，腹壁，假圈足。外髹黑漆，内髹红漆。耳和外壁上部彩绘梅花状装饰纹样。此式耳杯虽未有确切的地名标识，但同墓出土有数量较多的式耳杯，且制作工艺风格相同，当归属于同一产地——四川的产品（图一：6）。

Bb 型：内壁和杯心彩绘，有的通体绘彩。以装饰图案不同分式。

式：厚木胎，浅腹壁，杯内纹饰疏朗。荥经曾家沟 M21:4，内外髹黑漆，杯内朱绘对称花瓣纹，其间夹杂不规则点纹（图一：7）。青川战国 M37:1，杯内黑地朱绘卷草纹，耳朱绘波折纹，纹饰模糊（图一：8）。荥经曾家沟 M21:3，内外髹黑漆，杯内和耳面朱绘星云点纹（图一：9）。

式：木胎，色彩丰富，杯内纹饰丰富多彩，装饰极富层次感。江陵凤凰山 M168:193，杯内外髹黑漆，耳和外壁上部朱绘波折纹和圆圈纹；内壁上部朱绘变形三角鸟头纹二方连续图案；内底朱绘两只对称云鸟纹，凤鸟以涡纹为羽，卷云纹为足，想象丰富，中心和四周朱绘变形鸟头纹。外底有烙印文（图一：10）。江陵凤凰山 M168:175，杯内外髹黑漆，耳和外壁上部黄漆绘波折纹和朱绘圆圈纹；内壁上部彩绘变形三角鸟头纹；内底正中彩绘四瓣花纹，用黄漆勾边，花瓣涂朱和涂金；外围是三条大鲤鱼按顺时针方向环游，鱼身色彩艳丽，朱绘鱼头和鱼尾，





图三 圆盒

- 1、A 式（青川战国墓 M13：2） 2、A 式（江陵凤凰山 M168：211）  
3、B 式（荣经曾家沟 M21） 4、B 式（江陵凤凰山 M168：137）

黄线勾边，黄色和金色彩绘鱼鳞；鲤鱼周围彩绘金色圆圈纹，似乎是水中的气泡。整个装饰构思巧妙，写实性很强（图一：11）。墓葬出土的简册记“画杯”，当系此类有纹饰之耳杯。此式耳杯有的虽未有地域标记，但造型和装饰与同时期有“成市”铭文的四川漆器相同。如耳部规则的波折纹与圆圈纹的组合方式，及变形三角鸟头纹二方连续图案。

式：杯内纹饰母题多是动物纹，如怪兽纹、龙纹或凤鸟纹，外壁纹饰增加。胎壁较薄，夹纻胎和铜耳漆耳杯增多，铭文内容丰富。湖南永州鹧子岭 M2:65，木胎，双耳铜扣涂金。内壁髹红漆，外壁黑地朱彩，外沿饰梅花点纹，沿外及耳下饰勾连卷云纹，外腹壁绘凤鸟纹连续图案。外壁近足部锥刻铭文：“元延四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與髹画木铜耳黄涂梔容一升十六口素工

宣髹工政上工威铜耳黄涂工忠画工俞  
泅工护清工昌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敞守  
长口丞尚掾商守令史谭主”（图一：12）。朝鲜原乐浪郡石岩里 M194：94 始元铭耳杯，夹纻胎，内朱外黑，耳面边缘朱绘成组短弦纹与圆点纹组合的二方连续图案，里面是相对的两只朱绘怪兽纹。耳侧和外壁上部朱绘两行圆点纹。内底中间黑漆绘两只熊和怪兽，两两相对，外围是一圈成组短弦纹和两行圆点纹组合图案。外壁朱绘四条翔龙。外壁近足部刻画铭文：“始元二年蜀西工長廣成丞何放護工卒史勝守令史母弟喬夫索喜佐勝髹工當畫工文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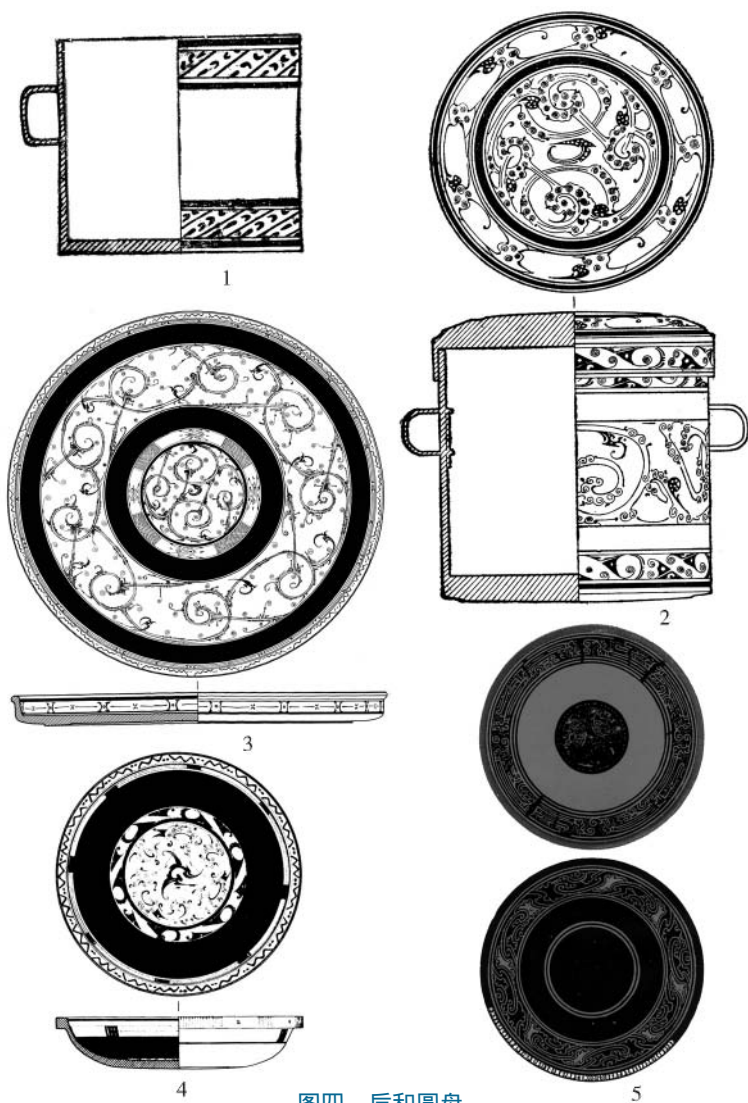
圆盒：依据顶部的变化分三式。

式：平顶盖。荣经曾家沟 M16:1，盖和器底为厚木胎，旋制，器壁用薄木卷制，接缝处斜面相交，器盖口部接近器身的下部，平底。内外髹黑漆，顶部饰两圈凹弦纹。盖上面刻划有“𠂔”字，盖内面刻划“𠂔”二字，三字近似金文作风。（图二：1）经专家考证“𠂔”是早期金文“𠂔”（草）的写法。

式：凸顶，盖和器底为厚木胎，器壁为薄木胎卷制。盖口部达器身的下部。纹饰有蟠螭纹、凤鸟纹、花瓣纹和几何纹等。青川战国 M41：2，通体髹黑漆，盖顶朱绘蟠螭纹，间以圆点云纹；外围有一圈变形三角形云纹连续分布，器身近底部有一圈点纹与

斜线组合二方连续。底部有两组填朱的“成亭（成亭）”烙印戳记（图二：4）。

式：弧顶，器壁较薄，卷制而成，出现多子窠。纹饰多样，色彩艳丽，显得极为华贵。江陵凤凰山 M168：13，外壁与口沿内、盖内、内底的中部髹黑漆，窠内髹红漆，并在黑漆地上满饰针刻花纹。盖顶有七圈花纹：中心花纹为一兽，其间填绘云鸟纹；第二、四圈为菱形纹和波浪纹二方连续图案；第三圈绘三只怪兽和二只似兔怪兽在云间穿梭；第五、七圈为云鸟纹；第六圈有鸟纹、卷云纹、三角形几何纹等，鸟两两相对，其间是三角形几何纹上下相对，并间杂漩涡纹构成连续图案。盖外壁与器近底处是云鸟纹，盖外壁下部与器内近口沿处为菱形纹和波折纹。盖内与内底也有针刻的云鸟纹、菱形纹与波浪纹等图案（图二：5）。针刻花纹纤细，富有动感，



图四 卮和圆盘

- 1、式卮（青川战国墓 M26：7） 2、式卮（江陵凤凰山 M168：138） 3、A 式圆盘（荆州高台汉墓 M2：6） 4、B 式圆盘（荆州高台汉墓 M2：4） 5、B 式圆盘（贵州清镇汉墓 M56）

装饰层次丰富，是四川漆器针刻艺术的代表作。

圆盒：厚木胎，子母口，上下形制基本一致，扣合而成。

A 型：凤鸟纹盒。

式：青川战国 M13：2，盖顶内为三凤鸟纹平分画面，中央为一三瓣花草，将三凤鸟分开；盖的肩部为变形三角连体云纹；盖和身口沿处、腹部为曲折纹加点纹的连续图案，以弦纹相隔（图三：1）。

式：装饰风格趋向华丽，繁缛，色彩绚丽。江陵凤凰山 M168：211，盖顶内朱绘三凤，作漫步回首状。以红色勾勒轮廓，灰黑无光漆饰颈、腹和翅；双足以速写笔调勾勒，三凤等分圆面，其间填充褐色卷云纹、漩涡纹，构图匀称。盖、器口沿朱绘 X 形卷云纹连续图案。盖的肩部

和身下腹部以朱、暗灰彩绘 X 形卷云纹连续图案。器底烙印“成市草”三字（图三：2）。

B 型：云气纹盒。

式：荃经曾家沟 M21 出土漆盒，顶部为单线卷云纹，中间为一花草纹；盖肩部和盒身近底部为连体卷云纹连续分布，其间点缀圆点纹（图三：3）。

式：装饰风格趋向华丽，布局密集，色彩绚丽。江陵凤凰山 M168：137，盖顶、肩和盒身近底部为彩绘圆卷状云气纹，其间绘变形鸟头纹，色彩有朱、褐二色。盖与盒身口部为波折纹和圆点纹组合图案。器底有烙印“成市草”、“成市素”和“成市饱”各一处（图三：4）。

卮：根据装饰风格分两式。

式：青川战国 M26：7，口径与高度接近，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口沿及底部朱绘斜线与点纹二方连续图案。底部有“成亭”戳记（图四：1）。

式：有单耳和双耳之分，纹饰布满全器，云气纹、变形凤鸟纹、凤鸟纹、几何纹集于一身。江陵凤凰山 M168：138，有盖，对称双耳，近底处内收成饼足。盖顶两圈和腹壁中部彩绘云气纹，中间夹杂朱绘变形凤鸟纹；口沿和底沿朱绘变形三角鸟头纹和点纹组合的连续图案。耳上朱绘变形饕餮纹。外底有“市府饱”、“成市饱”、“成市草”烙印文字（图四：2）。

圆盘：根据底部特征分两型。A

型：圈足盘

式：高圈足。商业街船棺 M2：30，整木斫制而成。敞口，浅腹，斜壁，足部呈喇叭状外撇。外壁髹黑漆，内壁髹红漆。圈足下半部朱绘一周变形龙纹和几圈弦纹；盘内黑漆绘圆圈纹、十字纹和变形龙纹。

式：直口，直壁，浅盘，矮圈足，形体较大，厚木胎。厚木胎，纹饰丰富，色彩多样，通体绘彩。荆州高台秦汉 M2：6，外髹黑漆，盘内纹饰区为黑地彩绘，三圈纹饰带，较宽的红漆带将每组纹饰区分开。中心和最外圈主题为云龙纹，龙体周围以点状或涡状云气纹，其间朱绘变形鸟头纹，仿佛龙飞凤舞，遨游于太空；中心外围是一圈网格纹和不规则线纹几何纹组合而成的连续图案；内腹壁和外腹壁朱绘弧线、点纹和横线



组合而成的连续图案；口沿波折纹和点纹组合而成的连续图案；外底边缘朱书一“李”字，外底中部有烙印文字“市府口口”（图四：3）。

B型：平底盘。

式：平底或圈底近平。荆州高台秦汉M2:4，折沿方唇，窄沿，深弧腹。外壁、内腹壁上部、内底中部髹黑漆，余髹红漆。内底中部用红、赭二色彩绘两圈纹饰。内圈中央朱绘大型的变形凤鸟，四周绕以漩涡状云气纹和小型的变形凤鸟纹；外圈朱绘变形三角鸟头纹；内外腹壁朱绘“B”形纹连续图案；口沿朱绘波折纹和圆点纹组合而成的连续图案。口沿背面朱书“李”字，外底中部烙印三“成”字（图四：4）。

式：蜀郡西工和广汉郡工官生产的，胎薄，夹纻胎较多，口部嵌铜扣涂金，纹饰内底为熊纹，铭文丰富。贵州清镇汉墓M56出土的圆盘，内外壁黑底红彩，内壁下半部髹红漆（封三）。内底为三熊纹，内外壁上腹部均饰云气纹。外壁近口沿处针刻隶书：“元始四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舆髹画黄铜钹槃容一升髹工则上工良铜钹黄漆工伟画工誼工平清工郎造护工卒史恽长亲丞冯掾忠守令史万主”（图四：5）。

#### 四、分期与年代推断

四川漆器生产从简单到复杂，从朴实到华美。时代不同，器物种类（表一）、色彩、纹饰、铭文、工艺等都有一定的差别。以典型器物为线，结合上述几点变化，并参照出土漆器遗址的相对年代，本文将商周至汉的四川漆器分成五期：

第一期：器物以生活用器为主，有A式耳杯、A型盘、簋、多格圆盒、案、几、式圆奩、器座、篋、木雕漆人头等，乐器有鼓和鼓槌；还有很多不明器。形体较大，厚木胎，斫制、削制而成，大件器物系分别制作后安装而成。髹红与黑两种色彩，一般以黑色为底，红色或褐色为彩。纹饰技法有雕花敷彩和单线勾勒再平涂，以龙纹和变形龙纹、蟠螭纹、窃曲纹为主，少量L形纹、虎纹、圆圈纹、垂叶三角纹等，主要采用单元格二方连续布局。整体风格略显单调，呆板，线条不流畅，有明显的毛边。漆器形制、纹饰及符号文字具有青铜器风格，表现其与青铜器的同时性。漆器明显受到青铜器制作的影响，依附青铜器成为时人重要的奢侈品、祭祀品和装饰品。其大规模生产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将其定为草创阶段。

该期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葬和荣经曾家沟早期墓葬出土的漆器为代表，时

代为商周至战国早期。宋治民先生认为曾家沟M11-16年代“上限似不能超过战国中期”<sup>[12]</sup>。不管其他文化因素如何，就漆器工艺而言，这批漆器较M21的更原始，战国早期比较合适。

商业街船棺葬和曾家沟早期墓葬出土的漆器，虽同时产于本地。前者数量多，种类丰富，装饰华贵；后者单一，素面无文。区别何以如此之大？这可能跟当时墓主人身份和经营性质有关。在古代，等级决定了与之配套的丧葬习俗，这是符合古人崇尚的“礼制”。商业街船棺葬是一处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而曾家沟早期墓群主人可能就是一般的平民。就经营性质而言，前者可能是专门为王族服务的王国手工作坊的成品；后者可能是一般的私营小作坊所造，可见当时官营与私营就并存发展了。

第二期：器物仍以生活用品为主，有A、Ba、Bb式耳杯、A式、B式盒、式圆奩、式卮、壶、匕、梳、双耳长杯、双耳长盒、碗、扁壶、发具等，新出现卮、奩、鸭泉壶、圆壶和扁壶，不见案、簋、盘、器座等早期大件器物。胎质有木胎、竹胎和陶胎，以木胎为主，木胎旋制、卷制和斫制而成。出现了在木胎上贴麻布的做法，这为稍后出现的夹纻胎工艺奠定了技术基础。漆色以黑、红为主，少量黄褐色。纹饰以漆绘为主，黑漆地上朱绘，单线描，笔法顺畅，纹饰有凤鸟、龙、兔、卷草纹、卷云纹、蟠螭纹、逗点云纹、点纹、变形三角云纹、柿蒂纹等，动物纹写实和夸张相结合，似凤非凤、似龙非龙（图二：2、3）。构图比较随意，布局有单独成画、三分圆形画面、连续和对称四种，总体风格疏朗。漆器上针刻或烙印文字与符号，内容有“成亭”、“成草”和物主姓氏，字体是秦属文字。“成亭”表明当时四川漆器生产由“亭”管辖经营，也表明秦文化对四川漆器的影响逐渐加强。

青川战国墓、荣经曾家沟M21和羊子山M172出土的漆器代表了战国中晚期四川漆器的发展水平。此时，群雄争霸，导致王国之间、地区之间和部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加强。四川漆器不断吸纳各地，尤其是楚、秦的漆艺经验，为以后集大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董恩正先生指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就以成都为中心，逐步形成了一个商业、手工业区，其中成都、郫县、雒县主要生产纺织品及铜器、漆器。”<sup>[13]</sup>所以将此时的四川漆器定为融合过渡期。“楚都迁陈后，大片国土的沦丧，使楚国的经济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损失最大的是丝织业、刺绣业和髹漆

业,从此一蹶不振了”<sup>[14]</sup>。四川代之成为漆器重要制造地。

第三期:器形有A、Ba、Bb式耳杯、Ba型、Bb式圆盘、卮、奩、A式、B式圆盒等,新出现大型的仿铜礼器,如鼎、钫、钟、匜、圆壶、盂、耳杯盒、樽、方平盘、多子奩(圆奩、椭圆形奩、方形奩、马蹄形奩组合)、陆博等。胎质有木胎、竹胎、夹纻胎和陶胎,以木胎为大宗,以器形的不同,综合运用多种制胎方法。出现了以旋制法制大型器物,如壶、鼎、钫、钟等。此时色彩丰富绚丽,有黑、红、黄、灰白、深蓝和赭色等,黑红为主,白色可能使用了油彩。

纹饰绘制有四种方法,除漆绘以外,新出现针刻、油彩、金箔贴花。其中马王堆汉墓遣策明确记载针刻名叫“锥画”,锥画出来的花纹,线条流畅,细如游丝,极富动感,这为以后发达的戗金漆器奠定了基础。纹饰主要有三类:动物纹、仿自然景象和几何纹,前二者写实和夸张变形相结合。动物纹有凤鸟纹、鱼纹、虎纹、豹纹和一些不知名的动物纹样(多见于针刻纹饰的漆器上),鱼纹则是该时期四川漆器比较有特色的一种纹饰。变形鸟纹形制多样,多与云气纹相杂。云气纹是主要题材之一,形制复杂,以卷曲状云纹居多,填以密集的小圆卷云纹。其流行可能与当时统治者敬鬼神事有关。《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时期)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文成(少翁)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正如李泽厚所说:“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中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sup>[15]</sup>。相对稳定的几何纹组合起陪衬作用,以二方连续为多。如波浪纹与圆点纹、变形三角鸟头纹、成组竖波浪纹、B形纹与线纹、成组菱形纹、点纹等。这些纹饰主要分布在器物的口沿或耳杯的耳面上。

此时,漆器制作明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相对固定的器形、纹饰和色彩。如在一个圆形画面里,中央有变形凤鸟纹一个,周围是大朵的卷云纹;以外有一圈纹饰,多是变形三角鸟头纹两两相对组成连续图案。这种规律性表明四川漆器已进入程式化生产阶段。

另外,在器物不显眼处多有漆书、烙印或针刻的文字或符号,内容丰富,包括漆器产地、物主姓氏、制器者、吉语、容积等,字体是隶书体。产地以“成市”(成市)草、“成市饱”、“成市口”、“市府”为多,反映成都市府管辖本

地漆器生产的事实。

以马王堆汉墓、绵阳双包山汉墓、荆州高台秦汉墓葬、江陵凤凰山汉墓和荣经古城坪秦墓出土的四川漆器代表了秦至西汉早期的发展水平。此时,四川漆器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以其匀称的造型和华丽的装饰,引领时代先锋,同时也改变了过去产品本地消耗的格局,远销到其他地区。四川逐渐取代楚地和咸阳而成为漆器生产和销售的中心地区之一。

此时,由于全国统一,各地生产的漆器共性多,个性少。四川漆器不断吸收各地的先进工艺,集大成于一家,不断向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特色,因此,将该期定为融合发展期,即大一统文化背景下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漆器生产阶段。王世襄先生也指出:“经过秦的统一和汉的兴起,楚地的文化习俗已有较大改变,而秦、蜀的髹饰工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和楚的漆工艺有了新的融合”<sup>[16]</sup>。

第四期:器形有Bb式耳杯、Bb式圆盘、榼(根据报告的描述可能是扁壶)、樽、旋等,以耳杯和圆盘为大宗。胎质有木胎和夹纻胎,夹纻胎增多。扣器发达表明漆器与金工两种工艺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以工艺取胜。正所谓“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砀器,金错蜀杯”。

色彩以红黑二色为主。漆绘和针刻纹饰,有云气纹、鸟纹、龙纹、熊纹和怪兽纹等,新出现了人物画像。同类器物与纹饰组合表现出高度的统一。

漆器文字为针刻隶书体,内容丰富,包括生产的时间、容积、地点、胎质、器名、工序、工匠名和管理的官员名字。这些文字对研究古代漆器,尤其是汉代漆器有很重要的意义。朝鲜原乐浪郡石岩里M194出土的始元铭夹纻耳杯铭文:“始元二年蜀西工長廣成丞何放護工卒史勝守令史母弟奮夫索喜佐勝髹工當畫工文造”。西汉晚期的王盱墓神仙画像木胎盘:“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挾紵行三丸治千二百盧氏作宜子孫牢”。宋志民先生认为“(这件漆盘)为蜀郡西工官监制而为卢氏作坊所承制。这种经营形式只有在私人经营的作坊生产技术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出现”<sup>[17]</sup>。西汉后期,各地豪强迅速崛起,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种经营方式的出现是可能的。

从漆器风格和铭文看,该期应在西汉中期到东汉早期。西汉早期四川漆器的大发展,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逐渐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中央与地方的碰撞,就是四川成为中央财政收入支柱。大约从景帝开始,中央政府就在蜀郡和广汉郡设立工官,主管漆器的生产,生产中心的地位得到

进一步巩固。漆器风格与中央考工、右工和供工保持高度统一。这反映在文化上,就是当时四川地区的族群已经完全融合进中原文化,在文化上、心态上认同了外来文化和中原统治,四川原有的地方特色随着文化上的融合而不断消失。此时,漆器产品规模、数量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证明其生产已到顶峰时期。

第五期:东汉中期。目前,囿于材料的不足,我们暂时无从知晓其发展情况。《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元兴元年(105年),其蜀、汉釭器九带佩刀,并不复调。”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原因:一、漆器工艺复杂,费工费时,正所谓“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盐铁论·散不足》)。二、政府已无力承担漆器生产的庞大开销。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四川工官漆器停止了生产。但漆器的制作却按惯性向前发展。私营漆器手工业得以继续发展而不受中央的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四川漆器又有所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从三国时期朱然墓出土的四川漆器窥见一斑。由此,暂时将其定为四川漆器的衰退期,暂时的钩沉是为以后的发展积蓄充足的能量。

### 五、结语

通过继承与不断吸收各地文化滋养,四川漆器经历了五次大的变化,即商周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秦至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期,总体特征分别是草创、融合过渡、融合发展、顶峰、衰退。这整个发展历程的背后则是地区与民族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附记:笔者为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此文亦为中心2006年度重点资助项目《四川漆器的早期发展》成果。)

注释:

[1] 聂菲:《巴蜀地域出土漆器及相关问题探讨》,

《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

[2] 李昭和:《战国秦汉时期的巴蜀髹漆工艺》,《四川文物》2004年第4期。

[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报告》,《2000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见《文物》2001年第11期。

[4]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四川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年第1期。

[5]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荣经县文化馆等:《四川荣经曾家沟21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6]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7] 荣经古墓发掘小组:《四川荣经古城坪秦汉墓葬》,《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绵阳永兴双包山二号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0期。

[9]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达州市文物管理所、渠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渠县城坝遗址2005年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第4期。

[1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11]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湖北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 宋治民:《四川地区的秦人墓》,《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又见《宋治民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 董恩正:《略谈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4] 张正明:《楚文化史》第3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4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16] 王世襄、朱家潘:《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8·漆器》,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17] 宋治民:《汉代的漆器制造手工业》,《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表一 早期四川漆器典型器物分期表

期	时代	典型器物																																
		耳杯			圆盘			圆奩	圆盒		卮	樽	双耳长杯	椭圆形奩	方形奩	马蹄形奩	匜	陆博盒	扁壶	圆壶	鼎	钫	钟	榼	耳杯盒	盂	簋	几	神像	案	器座	俑	方平盘	
		A	Ba	Bb	A	Ba	Bb		A	B																								
一期	商周至战国早期				√																						√	√	√	√	√			
二期	战国中晚期											√							√	√													√	
三期	秦至西汉早期				√						√		√	√	√	√	√	√	√	√	√	√	√		√	√		√					√	√
四期	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																							√										
五期	东汉中期																																	



● 贵州清镇汉墓M56出土黑底红彩圆盘漆器图



内饰



外饰